# 從「中」港簽訂服貿周年
## 看「中」港合拍片裡中國元素的轉變與影響

An Observation of the Chinese Elements in China-Hong Kong Co-production Films One Year after the Bilat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張裕亮（Chang,Yu-Liang）
南華大學傳播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 壹、前言

2015 年 11 月 17 日「中」港簽署《服務貿易協議》，這是繼「中」港雙方 2003 年 6 月 29 日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貿關係的安排》(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momic Parrnership Arrangement，簡稱 CEPA)10 餘年來，後續簽署多項補充協議的最新協議，這意味著「中」港雙方經貿關係越形開放，甚至可說是互通有無了。《服務貿易協議》的附件 1《內地向香港開放服務貿易的具體承諾》裡，針對合拍影片部分有關港方主創人員、內地主要演員、故事發生地、故事情節、影片沖印、允許港商在內地設立獨資公司發行國產影片等措施，做了詳細規定。明顯的，《服務貿易協議》為「中」港合拍片的持續推動，做了更具體的規範。

「中」港合拍片可溯自上個世紀 80 年代早期，當時香港電影工業發展蓬勃成熟，而中國大陸時值改革開放之初，電影還是計畫經濟產物，擁有的則是廣袤秀麗的山川景色及廉價的人力勞務，各電影廠連開拍電影資金都嚴重不足，因此吸引了一些左派電影公司以「中原電影公司」之名前往大陸，拍攝了知名武打片《少林寺》，一舉捧紅李連杰。另外，當年邵氏兩大導演李翰祥和張徹也先後回到大陸拍攝電影，李翰祥的《火燒圓明

園》、《垂簾聽政》都大放異彩。到了 90 年代的《新龍門客棧》、《青蛇》、《黃飛鴻》系列、《東邪西毒》、《霸王別姬》等都創下票房佳績，《新龍門客棧》更以 377 個拷貝數創下 1992 年度全國拷貝發行最高紀錄，成為 90 年代合拍片的代表作。這對當時大陸電經廠經歷文革 10 年，長期脫產以及與西方電影工業長期隔離，在拍攝方式、技術等方面都與香港電影廠有相當差距情形下，北上中國大陸的「中」港合拍，可以說是提供大陸內地電影廠學習及營收機會。

然而進入 90 年代後，香港電影市場榮景不再，且逐步衰退，到了 2000 年以後，更是急遽下滑。2007 年全年更只有 51 部電影，港產票房只有 2.75 億港元，而 1982 年香港全年港產片總票房已達 4 億港元。就在此時，2003 年以成龍為首的香港電影人代表團前往北京，與北京簽署了 CEPA 協議，該協議在 2004 年生效，以及據此推出的《關於加強內地與香港電影業合作、管理的實施細則》，將電影明確納入「更緊密合作」的範疇後，大幅放寬在大陸內地公映的香港電影配額限制，以及參與電影拍攝、製作的 ( 香港／內地 ) 人員比例限制。雙方的合拍模式得以根本改變，香港電影的身分由「境外電影」轉變為「境內電影」，同時港片不再受到 20 部引進大片的限制，通過審查即可在大陸公映。這對當時沈悶多年的香港電影市場不啻是一針強心劑。

依據 2003 年中國大陸與香港簽署 CEPA，其中對於合拍片作了如下的規範：1. 香港公司拍攝的華語影片經內地主管部門審查通過後，可不受配額限制，作為進口影片在內地發行；2. 香港與內地合拍的影片，可視為國產影片在內地發行；3. 對香港與內地合拍電影，允許港方人員增加所占的比例，但內地主要演員的比例不得少於影片主要演員總數的 1/3；故事不限於發生在中國大陸境內，但情節或主要人物必須與內地有關。

在 2003 年 CEPA 簽署前，香港電影被大陸內地歸類為進口片，受制於 20 部進口分帳影片的數量管控。CEPA 簽署後，龐大的大陸電影市場成為香港電影工業重要的市場。香港電影投資規模超過 600 萬港幣，就大多需要大陸內地市場的支撐。CEPA 將「中」港合拍片直接視為大陸國產影片在大陸內地發行的優惠政策，使得香港電影中合拍片的比重越來越大。

在此種情形下，香港寰亞、安樂、驕陽等香港電影發行公司紛紛北

上，陸續與大陸中影集團、華誼兄弟、保利博納集團等電影公司合作。大批香港電影人轉往大陸內地發展，例如香港導演陳可辛和大陸內地導演黃建新組成的「我們製作」電影工作室，與保利博納合作，並和中影集團簽署了策略性聯盟，在 2009 年初在北京成立「人人電影」公司。

根據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的統計顯示，2003 年至 2012 年間，大陸內地與香港合拍影片達 322 部，占內地與境外合拍影片總數的 68.5%；2013 年，獲准立項的合拍片共 55 部，其中內地與香港的合拍片占到 62%；2014 年，獲准立項的合拍片共 77 部，其中內地與香港的合拍片占到 60%。這些數據顯示，「中」港電影業經歷多年的接觸探索後，「中」港合拍片已在大陸內地取得佳績。

「中」港合拍片十餘年的合作經驗，固然為香港電影業帶來榮景，但由於中國大陸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卻也造成合拍片裡中國人形象轉趨正面，合拍片文化身分趨同中國大陸，在後 CEPA 時期以來，2015 年 11 月 17 日「中」港簽署《服務貿易協議》屆滿周年之際，香港電影的「再港片化」仍有其一定成果。

## 貳、合拍片中國人形象轉趨正面

長期來，香港影視文化塑造了一些刻板印象的大陸人形象，例如 1979 年電視劇《網中人》偷渡來香港，土裡土氣、頭腦簡單的「阿燦」。阿燦這角色奠定演員廖偉雄在演藝圈的地位，但「阿燦」也同時成為香港稱呼大陸人的代名詞。香港影視文化中的著名大陸人形象，還包括《表姐，你好嘢！》系列劇中，由鄭裕玲飾演行為舉止跟香港社會格格不入的「表姐」。另外，還包括了《省港旗兵》系列越界偷渡來香港大肆犯案的「大圈仔」，以及在多部電影中出現，跨界前來香港提供性服務的「北姑」等。

根據後殖民主義學者薩依德 (Edward Said) 提出的東方主義理論觀之，「命名」本身就是殖民者對他者施以宰制的一種手法，因此「阿燦」、「表姐」、「表哥」、「表叔」等這些帶有族群歧視的稱呼，充分展現了長期來港人自認為較大陸人的優越意識，同時也表達了九七前香港和大陸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上的差異。

然而，伴隨著 2003 年「中」港簽署 CEPA 協議後，「中」港合拍片數量的增加，大陸人在香港影視文化中的形象，逐步有所改變。例如，香港導演爾冬陞的浪漫喜劇《千杯不醉》(2005)，劇中由胡靜飾演的一位大陸女性趙潔，迥異於過往香港影視文化中的「北姑」、「表姐」負面形象，她已不再是處於弱勢的性工作者「北姑」，或者是與香港都市生活文化格格不入的「表姐」，劇情將她描寫成收購香港地皮，設立高級西餐廳炒高香港地價，財大氣粗的大陸「暴發戶」形象。

再如，在《超級警察》和《超級計劃》中楊紫瓊飾演精明幹練的大陸女公安，不僅與成龍飾演的香港皇家警察分庭抗禮，在《超級警察》中，楊紫瓊飾 演的女公安潛入大陸內地監獄，暗助當臥底 的香港特警成龍 混入軍火走私要犯豹強 的犯罪集團，最終完成任務，劇情也再現了大陸公安優於香港皇家警察。

再如，情節涉及大陸公安、軍方和政府部門貪污等敏感題材的電影，片商不能輕易取得上映批文，像周星馳早年主演的《國產凌凌漆》因有涉及賄賂公安的劇情，因此一直在大陸內地被禁映。但是，近年來大陸公安在「中」港合拍片裡的形象也開始轉變了。《省港一號通緝犯》試圖將公安形象定性為正直無私。稍後，由李連杰飾演公安幹警的數部影片，例如《中南海保鏢》和《給爸爸的信》更展現了專業、冷靜，受到現代化訓練，媲美國際水平的大陸公安正面形象。

## 參、合拍片文化身分趨同中國

大體上，一般正式的「合拍」，就是由一家有製作紀錄的香港電影公司，找一家大陸製片廠或電影局認許的民營電影公司簽訂合作協議，再由該內地「合拍」方出面，向國家廣電總局屬下的事業單位中國電影合拍公司辦理立項手續，關鍵是要有完整劇本可以送審。劇本首先是由合拍公司通過，然後再送呈廣電總局相關部門及領導審批，獲得通過後才由廣電總局正式同意立項，並發出拍攝許可證，理論上，要完成這個程序，合拍片才能開拍。影片完成後，先由合拍公司檢定，再送廣電總局審查通過，才能拿到放映許可証，最終能否在戲院上映，就要看檔期安排情形。

2008 年，大陸廣電總局出臺《關於重申電影審查標準的通知》列出 10 項有關電影的禁拍內容和 9 項需要刪改的內容，其中包括禁止「淫穢色情」、「庸俗低級」、「恐怖暴力」、「鬼怪靈異」等，使得香港擅長的類型電影黑幫片、恐怖片、三級片等難以合拍方式進入大陸內地。同時，中國大陸的電影審查禁止內容包括危害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的完整、禁止煽動民族分裂、洩露國家秘密、宣揚不正當性關係，嚴重違反道德準則等規條，都使得電影工作者進軍大陸內地市場，就要符合「合拍」條件而不斷修改劇本。

例如，2006 年《無間道》的原版結局中，本來是黑社會的劉德華殺死了潛黑幫的臥底梁朝偉，但大陸官方認為這是美化了罪犯形象，引起人們對罪犯的同情和讚賞，必須予以刪減或修改，為了迎合大陸電影審查準則，所以在大陸上映的版本變成殺人的是梁朝偉，以符合正義、警察才是對的一方。再如，涉及宣揚封建迷信的內容也是電影審查重點之一，2003 年由劉德華、張柏芝主演的《大隻佬》因題材涉及到輪迴題材被要求重新剪接。再如，杜琪峰導演的《黑社會》(2005 年 ) 在大陸內地公映時被改為《龍城歲月》，影片有十餘處被修改，最大的改變是將古天樂飾演的黑社會成員改成警方的臥底，電影主題成為暴徒得以繩之以法的道德故事。由此可見，中國大陸的電影檢查制度相當嚴格，經常破壞了合拍片電影的整體性，導致影片失去了導演原有想表達的內容，降低了電影的可看性。

不過，也有香港導演從合拍片過程中，體悟出如何與負責審片的中國廣電總局官員周旋，從而讓影片在中國大陸順利上映。香港導演爾冬陞就揚言自己是香港前三名最了解大陸內地審查制度的人。2003 年中港簽署 CEPA 後，爾冬陞有不少電影通過審批，在大陸內地上映，如《旺角黑夜》、《早熟》、《門徒》等。爾冬陞聲稱，他拍攝《門徒》毒品交易情節時，特意模糊了地點和軍隊的裝備、服裝，「因為金三角生產毒品的國家跟中國是友好關係」( 金三角是泰國、緬甸和寮國三國邊境地區的一個三角形地帶，盛產毒品 )。爾冬陞也表示：「《旺角黑夜》在大陸內地上映時，刻意安排吳彥祖的殺手角色是從南洋來，而不是大陸。」爾冬陞坦言，在大陸內地市場發行電影無法避免審批問題，所以自己在處理敏感題材時，會將「敏感」部分「虛假處理」。除了在電影「敏感」情節予以

「虛假處理」外，爾冬陞強調雖然 CEPA 有規定香港與大陸內地演員的比例，但也透露兩年前中國有關部門曾表明，只要香港電影達到「真、善、美」的標準，即使大陸內地演員數量不合比例，也有機會通過審批。爾冬陞強調，面對審查，他與岑建勳均認為香港電影人不需要「硬碰硬」，只要懂得調節便能殺出重圍，「要順利通過審查，可參考美國電影的方向，傳播愛和溫情的結局基本上就能通過」。

大體上，除了一些許鞍華導演的《桃姐》及《黃金時代》文藝片，以及杜琪峰、韋家輝導演和他們在香港創立的銀河映像，拍攝的有關「黑幫」電影，大部分北上的香港電影人，都逐步適應大陸內地的潛規則，但是在與內地的審查制度、政治文化環境、觀眾市場不斷融合的過程中，原本獨特的「港味」越發稀薄，地域特徵減弱，「中」港合拍片的文化身分也趨同於大陸內地市場化品味。

當然，也有一些香港導演試圖以隱喻的方式，在「中」港合拍片中傳達已快消失的「港味」。例如以拍黑社會電影見稱、電影往往難通過大陸內地審查的香港導演杜琪峯，2013 年的合拍片《毒戰》便獲得好評。由於大陸內地禁止涉「毒」電影，在《毒戰》中香港人「古天樂」返大陸內地販毒，但電影宣揚「反毒」，是正義的，所以故事情節在大陸內地又變得「合理」。香港本地觀眾則覺得古天樂角色有香港人機靈、小蠱惑的特性，是自己耳熟能詳，從中「可看到創作人開始懂得『轉彎』，曲線去講香港的特性、香港人的故事」。再如《竊聽風雲 3》電影裡，故事講述新界地產霸權，不僅切合社會議題，內容涉及反貪，高度契合「中」港兩地觀眾口味，又配合大陸當前反貪。

## 肆、本土懷舊港片—代結論

「中」港雙方於 2003 年簽署 CEPA，加速「中」港合拍片進程後，香港電影人紛紛北上中國大陸，所採取的合拍片方式不僅給原先低迷的香港電影注入活力，更逐步帶來龐大商機，讓香港電影有了巨大的生存空間。同時，大陸電影也因為借助於香港的製作經驗、電影人才和產業平臺，擴展了大陸電影在本土、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在「中」港合拍片蔚為大陸、香港電影工業主流之際，香港本土市場持續萎縮。但是香港電影是否就此束手無策？其實不然。特別是在 2015 年 11 月 17 日「中」港簽署《服務貿易協議》屆滿周年之際，全盤檢視後 CEPA 時期，「中」港合拍片對香港電影工業的衝擊，確有其重要之處。事實上，香港電影的「再港片化」仍持續進行，並有其成果。

例如，港產片中經典重拍和懷舊題材不斷湧現，面向香港市場的本土賀歲片重新翻拍，如黃百鳴的《喜事》系列《家有喜事》(2009)、《花田喜事》(2010)、《最強喜事》(2011)、《八星報喜》(2012)，以及邵氏與 TVB 電視台共同投資，曾智偉擔任監製、導演、主演的賀歲月《72 家租客》(2010)。同時，懷舊題材的本土中小成本製作，例如《文雀》(2008)、《天水圍的日子》(2008)、《歲月神偷》(2009)、《月滿軒尼詩》(2009) 等，重新回歸港產片對香港本土情懷的關注。

至於作為後 CEPA 時期留守香港本土代表性導演的杜琪峰，與其於 1996 年成立的「銀行映像」，在 1997 年到 2006 年香港電影工業持續下滑的階段，每年仍製作 3 到 4 部港產片。後 CEPA 時期，杜琪峰的作品《黑社會》(2005) 獲得第 25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在內的多個重要獎項，卻因為刻畫黑社會詳盡的入會紀錄，暗喻香港民主缺失的政治寓言性，在大陸內地上映時遭到刪剪。隔年的兩部作品《黑社會以和為貴》(2006) 和《放．逐》(2006) 都放棄大陸內地市場，以香港本地和海外市場為主。

這些從試圖從港人生活方式或文化身分角度，觀照香港社會近半紀世變遷的香港本土電影，正是針對 2003 年「中」港簽署 CEPA 以來，合拍片蔚為「中」港電影主流趨勢的有力回應。